

三
十
国
春
秋

蜀李书

汉赵记

三石传

燕书
秦书

南燕录

秦记

后秦记

凉记

西河记

敦煌实录

燕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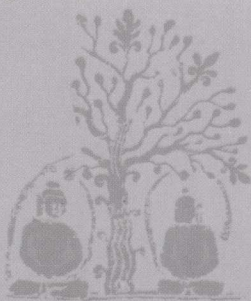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国

春秋 辑本

【清】汤球 辑
吴振清 校注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三十国春秋辑本

〔清〕汤球 辑 吴振清 校注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三十国春秋 / (清) 汤球辑; 吴振清校注. —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8. 10

ISBN 978-7-80696-603-7

I. 三… II. ①汤…②吴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五胡十六国时代—纪传体 IV. K238.0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79570号

三十国春秋辑本

(清) 汤球/辑

吴振清/校注

出版人/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E-mail: tjgj@tjabc.net

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375 字数 240 千字

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ISBN 978-7-80696-603-7

定 价: 25.00 元

序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出现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，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文化学术的繁荣如百花竞放，异彩纷呈。我们回顾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，魏晋玄学、志怪传奇、佛教文化和艺术、姓氏谱录、文献目录学、历史学……各种学科门类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，影响极其深远。

遗憾的是，那个时期问世的书籍，在唐宋以后大多数已经散佚失传。清朝学者为此作了卓有成绩的工作，从存世的古书、类书、古注中辑录出零篇断简，发掘和保存那些幸得流传下来的典籍文献。

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伊始，便确定汉魏六朝文史丛书校注工作，作为首选项目。《三十国春秋辑本》校注，就是丛书中的一种。

《三十国春秋辑本》包括十八种史籍：武敏之《三十国春秋》、萧方等《三十国春秋》、常璩《蜀李书》、和苞《汉赵记》、田融《赵书》、吴筠《赵书》、王度《二石传》、范亨《燕书》、车频《秦书》、王景晖《南燕录》、裴景仁《秦记》、姚和都《后秦记》、张谿《凉记》、喻归《西河记》、段龟龙



《凉记》、刘昫《敦煌实录》、张洎《南燕书》、高闾《燕志》。

两种《三十国春秋》，属于以朝代为断限的断代史书，其余十六种为十六国时期各割据政权的国别史。这些史书的体裁，既有纪传体，也有编年体。下面就各书及其作者的情况、文献价值、有关整理和校注等问题，分别作一介绍并略加论述。

一 史书与著者

(一) 武敏之《三十国春秋》：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与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一百卷。清人汤球从《高氏家谱》辑得南朝刘宋时高进之事迹一篇。台湾刘兆祐著《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》，在“霸史类”《三十国春秋钞》下作按语说：“刘宋武敏之及萧方等纂汉建安迄晋元熙间凡百五十六诸国事。”此话有误，汤球就是根据《隋志》和《宋中兴书目》，认为萧方等之书“皆不云及宋时事”，才判定《高氏家谱》所录“为武敏之之书无疑”的（见辑文后按语）。因辑文只见到汤球这一篇，虽然说百卷之帙不为不丰，却难以确知其断限和其他内容。武敏之为南朝刘宋时期人，事迹亦无可考。辑文文字流畅，叙事感人，2007年江苏语文高考试卷，节选了一篇人物传记《高进之》，即武敏之《三十国春秋》此篇辑文。

(二) 萧方等《三十国春秋》：《隋志》著录三十一卷，两《唐志》则云三十卷。汤球辑文，刘兆祐说“辑得七十二事，汇为一卷”（见上书“编年类”）。在整理过程中统计，实为一百零六则（整理校注时，经遍检群书努力搜集，今补辑二十一条）。汤球之外，王仁俊辑有一卷，收在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》。《三十国春秋》记载历史的上下限，《隋志》云：“起汉建安，迄晋元熙。”《宋中兴书目》说“起宣帝，迄恭帝”。宣帝指司马懿，他最初活动是在东汉末年建安时期，元熙乃是晋恭帝年号，元熙二年即被刘裕取代而建立宋。所以以上二说一致，记述了晋朝的历史。

史始末。这段时期包括了西晋和东晋，以及此期内先后立国的各个割据政权，刘兆祐据目录书云：“此编以晋为主，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。”

书作者萧方等的名字，时常被搞错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校勘记谓：“‘等’字各本原无。《隋志》‘方’误作‘万’。”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也误作“萧方”，脱落“等”字。还有的误“万”为繁体的“萬”，作“萧萬”。“方等”二字，出自佛典，以之取名，正可见萧梁统治者佞佛之深。萧方等在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均有传，方等字实相，乃元帝长子，母徐妃。他聪敏多才，善骑射。因元帝同徐妃感情不好的缘故，境遇不佳，心理有阴影，著论中慨叹人生苦短，向往与鱼鸟同游。常怀赴死之志，发生侯景之乱时他“身当矢石”，犯险不惧。终在讨伐河东王之战中兵败溺水身亡，年仅二十二岁。死后谥忠壮世子，后改谥武烈世子。

萧方等多才多艺，注范曄《后汉书》未就，撰有《三十国春秋》与《静住子》（《南史》作《笃静子》）行世。据《历代名画记》、《图绘宝鉴》记载，其绘画亦杰出，“善写真，座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成数人，问童子皆识之，兼工龙马，有《龙马出渥洼》传于世”。

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萧方等史学思想，有很高的评价，在《史通》一书中评论道：“续以金行板荡，戎羯称制，各有国家，实同王者。晋世臣子，党附君亲，嫉彼乱华，比诸群盗。此皆苟徇私忿，忘夫至公；自非坦怀爱憎，无以定其得失。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名谥，僭帝者皆称之以王。”“变通其理，事在合宜，小道可观，见于萧氏者矣”。可见刘知几十分赞同他不为正统观念、华夷观念所囿的历史观，能够比较客观的据实载录，反映当时历史的真实。

（三）常璩《蜀李书》：《隋志》著录为十卷，两《唐志》作九卷。此书记述了李氏据蜀始末，即成汉政权的国史。常璩字道



将，江源（今四川崇庆）人。刘琳对常璩居里做过调查考证，他说：“灌县旧《志》谓常道将废宅在城南三十里，即今灌县太平公社一带。”（《华阳国志校注序》）常璩在成汉李势统治时任散骑常侍，晋桓温伐蜀，劝李势降晋。成汉亡后，被桓温任为参军，后入晋秘阁。所撰成汉史《汉之书》更名为《蜀李书》（见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与刘知几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）。他另撰有《华阳国志》，这部书基本上完整的保存至今。

（四）和苞《汉赵记》：十卷（《新唐志》作十四卷）。记述汉刘渊、前赵刘曜的历史。据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篇，“刘曜时，平舆子和苞撰《汉赵记》十篇，事止当年，不终曜灭”。民国时朱希祖《十六国旧史考》说：和苞在书中“称曜为今上，粲为太子”，与《史通》所言该书记事下限正相合，成书在刘曜未去世之前。据辑文看，乃是记述刘聪、刘粲、刘曜三朝史事，310年刘聪称帝，329年刘曜与石勒交战被擒杀，所记为前赵二十余年历史。和苞官侍中，为谏阻营造寿陵，封平舆子，领谏议大夫。《晋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与严可均辑《全晋文》卷一四七，均收《谏营寿陵书》。

（五）田融《赵书》：又名《二石集》，十卷。两《唐志》云“田融《赵石记》二十卷，《二石记》二十卷”，重复有误。顾名思义，乃是记述后赵石勒、石虎史事。书中称石勒“前石”，石虎“后石”，据辑文，记事始自石勒跟随汲桑起义，终于冉闵杀石遵，后赵乱亡，备述后赵兴衰始末。田融在燕任太傅长史（见《隋志》），其他事迹无考。

（六）吴笃《赵书》：未见史志著录，记述的是后赵石勒史事。作者亦无考。

（七）王度《二石传》，附《二石伪事》：史志著录二卷。所记为后赵石勒、石虎史事。王度事迹，据《广弘明集》称“后赵中书太原王度”，知其为太原人，任中书著作郎，石虎统治时曾经讨论佛教事，令中书省官奏对，王度建议废止佛教。其谏废佛

疏文，载《高僧传》，《晋书·艺术·佛图澄传》和《通鉴》引文均有删节。

《晋书·职官志》载：“著作郎，周左史之任也……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，于此始有其官，隶中书省。及晋受命，武帝以缪征为中书著作郎。”后赵立国，沿袭魏晋制度，王度即是中书著作郎，为掌著述的史官，自当熟谙后赵历史，其后他入晋官中郎参军，才得以追撰后赵史著成以上二书。

(八) 范亨《燕书》：二十卷。隋唐《志》均著录。该书为纪传体，既有帝王的本纪，又有文武大臣列传。其书所记，如《史通》所言，是将前燕、后燕之史合成一书，记述时间跨度大，人物众多，内容丰富。

范亨仕履，《隋志》云“伪燕尚书”，考《史通》所记，后燕时董统草创后燕史，其后，申秀、范亨各自取材前、后燕史事，著成燕史。此所云“其后”，可以理解为后燕以后，慕容云在叛乱中身故，冯跋平乱建北燕，范亨任尚书，著燕史当是在北燕。北魏灭北燕，范亨入仕北魏，仍担任著述。《史通》记述：太武帝神䴥二年，召集文士修纂国史，范亨列名在内，其后史祸发生，“（崔）浩坐此夷三族，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”。范亨既参史局，相与著述，崔浩史祸，殆不能免，想来也在这百二十八人数内。事在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（450）。

(九) 车频《秦书》：隋唐《志》未著录，据《史通》说三卷。关于此书的唯一记述见于《史通》，《古今正史》篇云：“先是，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，值秦灭，隐于商洛山，著书不辍。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。整卒，（宋梁州刺史吉）翰乃启频纂成其书，以元嘉九年起，至二十八年方罢。定为三卷，而年月失次，首尾不伦。”可知原作者是前秦史官赵整。内容是记述前秦历史。车频乃冯翊（今陕西大荔）人，起初资助赵整，然后接续编纂，历时二十年。如果将赵整写作时间计算在内，两人前后费时至少在三十年以上。至于刘知几讥评“年月失次，首尾不伦”，可能



是车频史才欠佳，编纂不善吧。

(十) 裴景仁《秦记》：《隋志》作十一卷。关于此书，《史通》批评了车频《秦书》之后接着说：“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，删为《秦记》十一篇。”删正《秦书》，改成编年体，同样是前秦史著作。关于作者，《隋志》云“宋殿中将军”，寻绎《宋书》与《南史》，《沈昙庆传》记其事迹：“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戍彭城。景仁本北人，多悉关中事，昙庆使撰《秦记》十卷，叙苻氏事。其书传于世。”综合上述，景仁籍河东（山西永济东南），生长北方，任职刘宋时期改削成书。《隋志》有注：“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。”两《唐志》作“杜惠明”，其姓不知孰是？注亦未传世。

(十一) 王景暉《南燕录》：汤球原辑本作《南燕书》，今据《隋志》、《史通》改正。六卷。《隋志》云：记载南燕慕容德史事，伪燕中书郎王景暉撰。《旧唐志》误作王景暄。汤球辑文只有一条，这次整理增补二条。

王景暉事迹，《晋书·慕容德载记》有其献玉玺事，“会刘藻自姚兴而至，兴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暉随（刘）藻送玉玺一纽，并图谶秘文，曰：‘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。德受天命，柔而复刚。’”故王景暉弃后秦而献玺，留仕南燕担任史官。辑文正是记述此玉玺，“岁在丁酉，于长安渭滨得赤玺，上有文字曰‘天命燕德’”。此可补《晋书》有谶文而无玺文之阙。又《史通》云：“南燕有赵郡王景暉，尝事（慕容）德、（慕容）超，撰二主《起居注》，超亡，仕于冯氏（北燕冯跋），官至中书令，仍撰《南燕录》六卷。”综上述，景暉乃赵郡（今河北邯郸西南）人，由后秦入南燕任中书郎，撰写两种《起居注》。南燕亡后奔北燕，官中书令并撰《南燕录》。

(十二) 姚和都《后秦记》：《隋志》曰十卷，记后秦姚苌史事。

《晋书·姚兴载记下》记述有姚和都平叛事：晋安帝义熙十

二年，姚愔等发动叛乱，“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东官兵入屯马道南，愔等既不得进，遂烧端门……和都勒东官兵自后击之，愔等奔溃”。《通鉴》又记述了义熙十三年刘裕兵伐后秦，“秦主泓使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峽柳以拒之”。之后，“讨薛彤于河东”，迎击刘裕军于蒲坂。姚泓兵败降晋，后秦亡，姚和都遂降北魏，“泰常二年九月癸酉，姚泓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弟和都举镇来降”，官至左民尚书。

关于他著后秦史，《史通》云：“扶风马僧虔、河东卫景隆并撰秦史，及姚氏之灭，残缺者多。（姚）泓从弟和都仕魏为左民尚书，又追撰《秦记》十卷。”综合上说，姚和都乃氏族，后秦宗室，能征善战，入魏后追撰此书。考后秦史仅见此一种，弥觉其珍贵。

（十三）张谿《凉记》：《隋志》云八卷，两《唐志》作十卷。记述前凉张氏历史。张谿事迹不可详考，仅见《十六国春秋》所记：“敦煌人，仕张轨为著作郎，撰《凉记》八卷。”又《隋志》注称“伪燕右仆射”，疑“燕”是“凉”字之误。

（十四）喻归《西河记》：《隋志》与《广韵》曰二卷，《元和姓纂》言三卷。记前凉张重华时期事迹。喻（读音作 shù）归，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人，任东晋侍御史，穆帝永和三年（347）奉诏出使前凉，因前凉内乱频仍，各少数民族政权割据使道路阻隔，至哀帝兴宁元年（363）秋季方才南归，在凉州滞留十六年之久。喻归据其见闻撰成此书。在凉州事迹，《晋书·张重华传》有一段记述：喻归奉诏授予张重华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，“重华方谋为凉王，不肯受诏”。张重华“使亲信人沈猛与（喻）归言，归折之。《西河记》作于此时也”。（见张澍《西河记序》）其书久佚，汤球辑本之外，张澍《二酉堂丛书》亦有辑本一卷。

（十五）段龟龙《凉记》：十卷。考辑文内容，记述了吕光、吕纂、吕隆三朝，完整载述了后凉兴亡始末。《隋志》云伪凉著



作佐郎段龟龙撰，则其任后凉史官，所著乃其国史。

(十六) 刘昉《敦煌实录》：《隋志》云十卷，两《唐志》、《魏书》本传均说二十卷，朱希祖考证谓：“唯《敦煌实录》有十卷、二十卷之别，则未知孰是。考《十六国春秋·北凉录》：‘沮渠茂虔永和四年（436）遣使如宋，献《凉书》十卷，《敦煌实录》十卷。’《宋书·大沮渠传》：‘元嘉十四年（437），河西王茂虔……并献《敦煌实录》十卷，《凉书》十卷。’按：此二书皆刘昉撰，时昉已仕北凉……十卷为是。”其书所记主要是西凉历史。

此书不仅有汤球辑本，还有王谟辑本，章宗源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也有征辑，张澍辑文收入《续敦煌实录》，朱祖延《北魏佚书考》也辑入了此书。

刘昉，《隋志》作刘景，乃是避唐高祖之父李昀名讳，改昉为景；《旧唐志》作刘延明，避名讳而改称其字。《魏书》与《北史》均有传：敦煌人，以儒学传家，隐居酒泉讲学，应西凉李暠征辟任儒林祭酒、从事中郎。北凉沮渠蒙逊时期任秘书郎，号称玄处先生，沮渠牧犍尊之为国师。北魏太武帝平凉州，授为乐平王从事中郎。他学问淹通，受业弟子众多，历仕三国备受礼遇。其著述颇丰，因为看到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东观汉记》三史卷帙浩繁，删写成一部通史《略记》。著有《凉书》、《敦煌实录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靖恭堂铭》；注解《周易》、《韩子》、《人物志》、《黄石公三略》。他注释的魏刘邵《人物志》三卷，留传到现在，《畿辅丛书》中就收有该书。

(十七) 张詮《南燕书》：五卷（《新唐志》云十卷），记述南燕历史。张詮事迹无考，仅据《隋志》知道他是“伪燕尚书郎”，当是南燕史官。

(十八) 高间《燕志》：十卷。据《隋志》所说“记冯跋事”，乃是北燕历史。高间在《魏书》有传，字閼士，渔阳雍奴（今天津武清东北）人。自幼好学，博览经史，北魏时征召为中书博士，官至中书监。雍奴，故燕地，他生长其间，谙悉后燕、

北燕时期之事，于是著作了此书。

二 学术成就

汤球将十八种史籍的辑本汇为一编，集中反映了两晋时期历史，其中包括了十六国阶段。纵观此时期的社会状况，大规模的民族大冲突，大融合，北至辽东、大漠、西域，南至沿海，多个民族在社会和历史的舞台上驰骋纵横。在较长的历史时间内，群雄割据，政权林立，动乱和分裂成为时代特征，而社会科学的作用却格外受到重视，文化学术出现繁荣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历史学步入了独立发展壮大阶段。

乔治忠在本丛书的《众家编年体晋史》校注前言中说：“史家竞相记述近世和当代史事，成为这个时期史学活动的重要特征。”其中晋史的撰述，“见于著录的纪传体和编年体晋史至少有二十六家之多”。

《三十国春秋》记事以晋为主，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。将此书与十几种十六国旧史合辑在一处，视之为存在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，同是记述两晋和十六国等各个割据政权历史。因此我们也综合起来略加论述。

（一）惊人的历史学成就

盛世名著一向是人们关注的热点，反映这一动乱时期的史籍，以及十六国史书，却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。一则在封建正统史观的影响之下，视割据政权为僭伪、私署，不承认其存在的历史地位，因而其史学随之遭到摒弃和排斥的命运。二则受华夷观的局限，把少数民族视为蛮夷异族，被民族歧视与偏见所囿，主观的视其文化为荒漠，史学成就无足轻重。三则认为诸政权享国短促，战乱连年，没有值得研究的文化和史学可言。四则年代久远，文献屡遭厄运，史籍亡佚，资料无征，研究困难。

由于上述诸种原因，十六国之史，南朝阮孝绪《七录》中称



之为“伪史”，两《唐志》沿袭之。《隋志》立“霸史”之名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明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等目录书因之。及清代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又叫“载记”。历代官、私目录的这种归类，本身就欠科学，有意识的贬斥。史部书的分类，正史、编年、杂传等类，主要是按书的体例划分；职官、地理、谱系等类，着眼书的内容划分。惟独伪、霸立类，却是从政治以及正统的角度来划分。

针对此一现象，在唐代刘知几就曾经提出批评：“当晋宅江淮，实膺正朔，嫉彼群雄，称为僭盗。故阮氏《七录》，以田（融）、范（亨）、裴（景仁）、段（龟龙）诸记，刘（前赵）、石（后赵）、苻（前秦）、姚（后秦）等书，别创一名，题为伪史。及隋氏受命，海内为家，国靡爱憎，人无彼我。而世有撰《隋书·经籍志》者，流别群书，还依阮《录》。案国之有伪，其来尚矣。如杜宇作帝，勾践称王，孙权建鼎峙之业，萧誉为附庸之主。而扬雄撰《蜀记》，子贡著《越绝》，虞（溥）载《江表传》，蔡（允恭）述《后梁史》；考斯众作，咸是伪书。自可类聚相从，合成一部，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？”（《史通》卷五《因习》）

阮孝绪身为南朝梁人，南朝承袭东晋，《七录》立伪史尚情有可原。隋、唐国家一统，民族一家，仍然依《七录》而立霸史，就极不妥当了。如果正视现实，客观的考察十六国时期的史学，就会有惊人的发现。

首先，史学的地位确立。

魏晋以来，史学迅速发展，到这时期，史学终于从经学的附庸地位分化出来，独立门类。

后赵石勒元年（319）始建社稷，“署从事中郎裴宪、参军傅畅、杜赧，并领经学祭酒。参军续咸、庾景，为律学祭酒。任播、崔浚，为史学祭酒”。（《晋书·石勒载记下》）后赵官方宣布创立史学，与经学、律学并列于官，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职。

此一举措标志着史学取得独立地位，与经学同等取得了社会的承认，这也是首次出现“史学”名词，此一学术名词的产生及其丰富内涵，表明了这个学科的成熟和确立。后赵立史学，比南朝宋文帝时期立儒、玄、史、文四学，要早一百多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后赵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，他们同样想使自己的事业彪炳后世，同样想从历史记述中鉴前启后，于是形成了历史学发展的空间。

（二）修史活动得到普遍重视

晋沿魏制，设有著作官执掌记注和撰史工作，十六国诸统治者效法汉族王朝，大多数在兆基伊始，即建立掌著述、典史职的机构，设置史官。

最早立国的汉赵，设有史官“左国史”。襄陵人公师或以故知仕刘渊，刘聪时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，撰述汉君臣纪、传。古代《周官·礼记》即有左、右史之名，三国时吴国设有左、右二国史，汉赵因袭之。刘曜时和苞任著作郎，撰述国史。

后赵石勒在319年称王，立宗庙社稷，署任播、崔浚为史学祭酒，命记室左明楷、程机撰《上党国记》，中大夫傅彪等撰《大将军起居注》，参军石泰等撰《大单于志》。石虎沿袭修史，王度任中书著作郎，著《二石传》等后赵史。

在前凉，张谠仕张轨为著作郎，撰国史《凉记》。张骏时西曹掾索綯著《凉春秋》，又有刘庆迁官儒林郎，撰其国书。

前燕有崔逞任著作郎，撰燕国史。封懿也曾任史官，著国史，慕容暉时撰成《燕书》。

前秦有史官赵渊、车敬、梁熙、韦谭相继著述，因语涉官闾隐私，史书被苻坚焚毁，此后命著作郎董道追录旧史。秘书郎赵整也曾参撰国史，及秦亡后隐居撰写秦史。

南燕中书郎王景晖撰有慕容德、慕容超二种《起居注》，其后又著述《南燕录》。尚书郎张诠亦著有《南燕录》。

南凉秃发乌孤初定霸基，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，掌撰国史。



成汉李雄“兴学校、置史官”（《晋书·李雄载记》）。据《史通》的记述，“蜀李与西凉二朝，记事委之门下”，则是设置修史著作在门下省。

西凉李暠建初四年（408），发现白狼、白兔等兽，“又有神光、甘露、连理、嘉禾诸瑞，请史官记其事”，可知设有记注史官。刘昞在西凉为儒林祭酒，修撰史书。

后燕慕容垂在建兴元年（386），命董统草创国史，著本纪和佐命功臣、王公列传。

后凉著作郎段龟龙、北凉中书郎宗钦、夏著作郎赵逸，皆受命修撰国史，纂述成书。

以上各政权设置史官，或属之中书省，如后赵、北凉；或隶于门下省，如成汉、西凉。史官名称不一，中书郎、秘书郎，或著作郎，然而却实实在在的是担负史任的专职。有君主授命，官方组织的大小不等的修史活动，见于记载者屡屡有之。

（三）史书编纂、发凡起例和命名的创新

成汉常璩撰有《华阳国志》，梁启超认为，集一方之地理、历史、人物艺文为一编，荟萃多方面的内容，实际上奠定了方志编纂体例的基本模式。这在史书编纂法和形式体例上是个突破。该书史地人文兼收并蓄，处处体现地方史的特点，所以刘知几划分史书体例，以《华阳国志》超出二体外，不在六家中（二体指编年体、纪传体，六家指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家），称之为“郡书”，乃后世方志开山之作。

据余嘉锡先生考证，最早以“实录”命名史书的，是史学家刘昞。李暠立国，史称西凉，建都敦煌，刘昞撰西凉史《敦煌实录》，余先生认为：“古之以实录名书者，实始于刘昞。”“以地名书，非如唐宋之实录也……盖昞籍隶敦煌，著书以序耆旧，因其地尝为国都，故纪李暠之事以提纲……后来许嵩《建康实录》画地为书，非都建康者不录，举例命名，盖昞于昞。”此外，五代时蒋文悛撰《闽中实录》亦本于此。

蜀之常璩，凉之刘昉，南北两大家，堪称十六国史作者中之翘楚。

三 文献价值

十八种久佚史书的辑本，虽然是零篇断简，却仍然有较高的价值。下面略举数例来作说明。

（一）具有原典文献的珍贵

萧方等《三十国春秋》有较高的价值，唐杜延业据此书撰成《晋春秋略》二十卷，又有不知名者写成《三十国春秋钞》一卷。宋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其中《晋纪》部分，许多史事参考和引用了《三十国春秋》，在正文中直接引录了萧方等的一段史论，可见对此书的重视。

其余十六国史，多数是各个割据政权的史官记述本国历史，身经目睹当时之事，真实性和可靠性自然超过后世的著作。如：描写苻坚神态行动的一段，裴景仁《秦记》称：“苻坚方食，抚盘而诟！”及崔鸿撰《十六国春秋》，“乃易‘抚盘’以‘推案’”。对此刘知几批评说：“夫近世通无案食……直以事不类古，改从雅言，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，察古今之有异？”后人改写，增饰，往往与当时习俗的实际有距离，造成内容的失真。语言文字也有时代特色，后人也难模拟。崔鸿距十六国时期不及百年，《十六国春秋》也是记述这段历史的重要史书，尚且不免此弊，由此可见第一手资料何等可贵。

（二）补充正史缺漏

辑文中有些内容，可以补充正史记事的不足，如田融《赵书》记述了携领石勒起义、并为他取姓命名的汲桑，石勒的重要谋臣徐光，皆是这个历史阶段起过一定作用的人物，唐修《晋书》缺乏记载，赖田融《赵书》辑文保存了一些事迹。还有参军周延和俳优共戏的记载，有人据此条辑文认为盛行于唐宋的参军



戏，即形成于后赵。所以这条辑文不失为戏曲史之有用资料。

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，当然不能舍此他求，据《魏书》载，崔鸿写作《十六国春秋》过程中，因为未能寻觅到常璩《蜀李书》，竟然搁笔十五年以待。萧方等作《三十国春秋》、刘孝标注释《世说新语》、徐广著《晋纪》，以及唐朝初年修《晋书》、宋代司马光编著《资治通鉴》，都利用了十六国时期史籍。在此意义上说，这些原始文献，要远胜后来二次或多次加工的作品。

（三）中华民族史的宝贵资料

十六国旧史是民族大融合的记录，也是各个民族发展演进的见证。十六国史书中不少内容上述先民，下迄当世，备述民族迁徙、兴衰、立国的始末，为古代民族史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与发展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对各民族的研究，如匈奴史、羌族史、鲜卑族史等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因为少数民族生活地域的关系，所以对于边疆史地人文，生产生活，都有真实的反映，记“五凉”则详于西北，述成汉则周于西南，载诸燕则备述漠北辽东，扩展史书记事领域的同时，也丰富了撰写内容。各民族的风土人情，习俗琐事，尽入史家笔下。

西晋永嘉之乱以后，“秦川中，血没腕，唯有凉州倚柱观”。当时的民谣反映出西北地区幸免战乱的情况。黄河以北及江淮间，汉、赵、秦、燕混战不已，中原人士避往江南或转徙西北，河西一带成为社会安定、经济发展、文化发达之地。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异常关注西北地区，陈寅恪更是多次申论：“刘石纷乱之时，中原之地悉为战区，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，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，外来避世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。”

张轨建前凉，吕光建后凉，后其地三分，李嵩为西凉，秃发乌孤为南凉，沮渠蒙逊为北凉，分据河西五郡。此后北魏、北齐